



张大栢 / 著

宗教体制

与
日本的
近现代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张大栢 / 著

宗教体制



日本的
近代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张大柘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80123-803-6

I. 宗… II. 张… III. ①宗教-体制-研究-日本-近代②宗教-体制-研究-日本-现代 IV. B9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301 号

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

张大柘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宗 文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49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123-803-6/K·180

定 价: 28.00 元

序

毛泽东主席 1964 年在关于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批示上说：“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建议中央宣传部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且明确地表示：如果不开展对宗教神学的研究，“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周恩来总理曾指示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后应对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全面的研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文革”结束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才得以全面开展世界宗教的研究工作，在组织和完成重要课题，培养人才和积累资料，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同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的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也开展宗教研究，取得多方面的成绩。

然而从整体来看，笔者认为在宗教研究领域仍存在

不少薄弱乃至空白的地方。我们至今对世界三大宗教的世界史、国别史乃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史的研究,似乎尚未充分地展开,成果仍很有限;至于对各国的重要宗教派别、宗教人物、宗教事件、宗教教理、宗教制度、宗教文献、宗教学理论以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与介绍,也未能全面展开。因此,今后对这些方面继续开展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任务也是艰巨的。

日本自古以来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关系。然而在 19 世纪后期至上世纪 40 年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和掠夺,致使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二战结束,特别在中日恢复邦交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两国无论在政府之间还是民众之间的各种友好交流都曾呈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这种情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日本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丰硕的和多种多样的。

在对日本宗教研究方面,据笔者所知,在佛教和神道教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笔者和本书的作者张大柘同志曾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从事日本佛教研究,也同时从事日本神道教研究。在笔者撰写《日本佛教史》之后,与张大柘、高

洪共同完成《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撰写工作。此后,张大柘撰写的《当代神道教》、《新兴宗教与日本近现代社会》二书相继出版。现在又高兴地看到她写完《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这一课题的完成很有学术意义,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对日本宗教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日本的宗教自古以来有源自本民族原始宗教的神道教、来自中国的佛教及进入近代之后从西方逐渐传入的基督教。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宗教体制上也相应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带有军事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专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在文化及宗教诸领域也实行严密的强制的统制政策。政府以神道教不是宗教而是国民必须信仰尊奉的“国家宗祀”的名义,规定“敬神忠皇”和参拜神社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从而将神道教奉为高居于各种宗教之上的国教。这一既是政治的又是宗教的体制,对近代日本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宗教等,产生了极为恶劣和深远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一书以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为分界,密切结合日本的社会政治背景,对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宗教体制的形成与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并以神道教、佛教和诸种流派的新兴宗教为重

点,介绍了这些宗教在战前与战后的存在和发展情况,揭示日本宗教的特点和今后发展的趋势。

笔者在翻阅此书后,认为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写得比较好,写出了特色:

一、对明治维新之后神道教如何从长期以来依附于佛教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国教的原因和经过,对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的内容和实施情况,作了概要而清晰的论述。

二、对二战期间日本佛教各派追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屈服于法西斯的战争体制和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积极支持甚至参与对外侵略的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三、对日本战前与战后属于佛教系、神道系及基督教系的诸种新兴宗教的起源、教义及流传情况作了比较周详的考察和介绍,特别对战后新兴宗教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论述。对其中最有影响天理教、金光教及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等重要派别的介绍,更加系统。对近年出现的某些邪教“法之华三法行”及奥姆真理教等也作了观点鲜明的批判性的介绍,有现实意义。

四、资料翔实,吸收了不少当代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结构合理,行文也比较流畅。

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人们了解日本近现代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派别随应社会政治背景的表现及各种宗教派别的运营的体制,提供方便,并为人们今后继续展开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基本的线索。

日月穿梭,光阴如流。张大柘同志对我说,从她1975年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至今已有30年了,即将进入花甲之年,也要退休。笔者想,此书撰写完成并交付出版,可以说是对她30年来辛勤学习和研究的最好酬报和纪念。

张大柘希望我为此书写序。笔者虽然近来忙得不可开交,然而还是答应下来,便信手写了以上文字,算是对此书出版的祝贺吧。

杨曾文

2005年10月17日于北京市华威西里自宅

目 录

序	杨曾文(1)
---------	--------

第一章 国家神道体制的形成与完备	(1)
------------------------	-----

一、国家神道体制形成的政治前提	(1)
-----------------------	-----

二、建立国家神道体制的宗教基础	(10)
-----------------------	------

1. 神社神道的广泛民众性	(11)
---------------------	------

2. 神社祭祀的鲜明民族性	(20)
---------------------	------

3. 与皇室关系的紧密性	(31)
--------------------	------

三、国家神道体制的确立途径	(41)
---------------------	------

1. 实行神佛分离政策	(42)
-------------------	------

2. 全方位整合全国神社	(49)
--------------------	------

3. 变革神职制度	(61)
-----------------	------

4. 教化国民运动的铺开	(64)
--------------------	------

第二章 国家神道思想体系解构	(70)
----------------------	------

一、天皇崇拜绝对论	(72)
-----------------	------

1. 国家神道的天皇观	(72)
2. 天皇崇拜绝对论的文化渊源	(78)
3. 天皇崇拜绝对论的思想根源	(80)
4. 强权的鼓噪与推销	(88)
二、忠孝一本思想	(93)
1. 国家神道的忠孝观	(93)
2. 忠孝一本思想之探源	(99)
三、神国日本和八纮一字思想	(104)
1. 神国日本思想	(104)
2. 八纮一字思想	(109)
 第三章 国家神道体制对宗教的制约与异化	(121)
一、多途分化的神道界	(124)
1. 神道教派简况	(124)
2. 屡受压制的天理教	(128)
3. 一波三折的金光教	(134)
4. 发展顺利的黑住教与神道修成派	(137)
二、亦步亦趋的佛教界	(145)
1. 佛教与政权集团关系的回顾	(146)
2. 佛教对国家神道理念的屈从	(154)
3. 佛教支持侵华战争的活动	(161)
三、命运多舛的新兴宗教	(166)
1. 新兴宗教概说	(166)
2. 战时体制下的新兴宗教	(169)

3. 个别教团得以顺利发展的内因	(179)
------------------------	-------

第四章 政教分离体制的确立与传统宗教的

应对	(184)
一、国家神道体制向政教分离体制的转变	(186)
1. 《神道指令》的颁布	(187)
2. 天皇神性的否定	(189)
3. 新宗教法规的出台	(191)
二、政教分离体制下的神社神道	(196)
1. 神社神道界的重新整合	(198)
2. 重建神社经济的多种尝试	(209)
3. 开发神社活动的新探索	(214)
4. 横向联合意识的迅速提升	(225)
5. 神道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	(228)
三、政教分离体制下的传统佛教	(231)
1. 传统佛教直面危机	(231)
2. 各宗派的诸种革新	(236)

第五章 政教分离体制下的新兴宗教

一、战后新兴宗教的迅猛发展	(259)
1. 战后初期新兴宗教简况	(259)
2. 新兴宗教的时代特征	(265)
二、新兴宗教崛起的内因	(278)
1. 现世主义的教理是新兴宗教快速发展的	

根本源泉	(278)
2. 完善的组织建构是支撑新兴宗教发展的 骨架	(288)
3. 多样化的传教手段是推动新兴宗教不断 壮大的原动力	(296)
三、新新宗教的发展态势	(303)
1. 新新宗教教理及结构特点	(304)
2. 催生新新宗教的社会条件	(309)
3. 混杂其中的邪教	(314)
 主要参考书目	 (327)
后 记	(330)

第一章 国家神道体制的形成与完备

翻开日本近代史,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国家神道体制的确立及其恶性发展。自明治维新直至日本军国主义战败,国家神道体制笼罩日本约 80 年之久,这是一种兼具政治与宗教双重性的国教制度,亦是君权与神权、政权与教权合二而一的政治制度。在其肆虐的 80 年中,对日本宗教的扼杀与扭曲自不待言,就是对整个国家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凡是与政治、思想、宗教、文化、道德等范畴相关的,几乎都摆脱不了国家神道的制约。本章将围绕国家神道体制确立的背景、条件及外在作用力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国家神道体制形成的政治前提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权集团都要求社会的宗教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并与自身需要的社会秩序相适应。因此,当政者推行什么样的宗教路线,建立什么样的宗教格局,都是以是否有益于巩固王权或政权为底线的。国家神道体制的生成,

再次印证了这一通则。

国家神道体制的产生,不是突兀、孤立的现象,而是和近代天皇专制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相伴生的,是为天皇集权化与神圣化的政治体系服务的,因而近代天皇专制的国家体制是国家神道形成的首要政治前提。

日本的天皇制经历了兴盛——衰落——再兴盛的发展轨迹。自7世纪推古天皇时代正式起用“天皇”的称谓,至今已绵亘一千余载。在漫长的岁月中,天皇家族的命运与作用发生着戏剧性的沉浮变化,既有“奉天承运,代神行权”、叱咤政坛的辉煌,也有大权旁落、沦为武家幕府之依附的潦倒。总之,日本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专制天皇制和现代象征天皇制的三大时期。明治维新则是确立近代专制天皇制的起点。

近代的日本,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不仅把长期处于锁国体制的社会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且像“彗星”一样跃登世界舞台,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在诸方面显示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明治初年,新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政治上,新政权立足不稳,要应对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旧士族的反叛;经济上,百废待举,国家面临“一金无储”的窘遇;理念上,天皇的神统形象在民众心目中十分苍白。由于幕府的长期抑制,天皇不问国事,专事学问,其社会威望微乎其微。因而,如何尽快建立一元的中央集权体制,实现国政向天皇“神之道皇政”的回归,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

1867年1月,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支持下登上皇位,确立了“恢复神武帝之肇基,图寰宇之统一”的总体目标,构想出尊崇天皇,政出朝廷的“王政复古政体”的理想蓝图。随着江户幕府的彻底灭亡,近代天皇制时代的开始,这一构想进入了付诸实践

阶段。新政府高举“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建设近代天皇制国家的三大纲领,在各个领域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资产阶级变革,一道道革新政令从皇宫发出,一项项改革措施陆续推出,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只着墨于政治建制方面的变革。

政治建制的改革可以从 1868 年 1 月天皇发表“王政复古大号令”算起。该号令遵循“诸事按照神武天皇创业之始”的既定方针,宣布新政府的诞生和人事安排,宣布一切权力收归天皇,废除幕府和将军制,废除摄政、关白制度及所有旧官职。但此时的政府远非近代天皇制的国家机构,只能称作维新新政权的雏形,在组织设置等诸多方面尚不成熟。因此,自新政府宣布诞生之日起,其机构建制就处在“朝令夕改”的不断变动中。仅在 1868 年至 1871 年的短短数年内,就有 5 次大的中央官制改革,此后还不断进行细部调整。但无论做何种变动都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根本宗旨就是立足天皇专权中心主义,以古代天皇制的官僚体系为范本,逐步向天皇专制的政体过渡,最终作为国家的政治体制巩固下来。主要是通过太政官和神祇官的立制完成的。

1868 年 6 月新政府公布其组织法《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的律令制,推行“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的太政官署专权制,以杜绝“政令出自二途之患”。按其规定,太政官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这次改革只做到了把辅弼天皇的政治机构明晰化,没有在制度上说明天皇作为君主的政治地位。

1869 年 7 月《职员令》的实施,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专权机构初成体系。《职员令》把着力点放在确定天皇权力地位与政治

地位上。《职员令》并没有关于天皇权力的具体文字,其思想完全浸透在整个机构的设置和官吏职责当中。最重要的是,天皇下设神祇官和太政官,明确规定神祇官位于太政官之上,从而在组织建构上昭示出祭政一致或祭优先于政的方针。

1871年新政府再次调整太政官制,改为正院、左院和右院的三院制,正院作为权力中心居最高位置,拥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决策权,而且明确规定天皇必须亲临正院,“总裁万机,奖督庶政”。通过这一改革,正院实质上成为天皇亲政的官厅,大政大臣成为天皇最高的政治辅翼官员,从制度上赋予了天皇作为政治君主的性质,开始成为国家统治权的主体。

1875年5月,根据天皇特别委派而组建的内阁,掌握着起草政策法令、监督政务的实权,在以后的数次变革中,其职能不断扩充,成为以天皇和主要大臣为中心的专权机构。至此,基本完成了一切权力悉归天皇的政治建制。

对于新生的明治政府而言,沿袭数百年的诸藩政权是一最大威胁。尤其是参与了平定内乱的各藩,居功自傲,各自为政,常与中央政权发生对立,且有不断扩大升级之势。为了尽早清除隐患,新政府采取了两大决定性措施:一是以谋略手段,让各藩“奉还版籍”,把过去各藩主领有、支配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交还天皇,朝廷任命藩主为藩知事。这样,通过奉还版籍的和平方式,收回了旧藩主的政治权力,使之变身为朝廷的地方官员,初步建立起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二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废藩置县的举措根本解决藩政问题。在奉还版籍之后,各藩主虽然改变了身份,但事实上依然是世袭的领主,持有相对独立的领地统治权,加之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和中央政府的离心作用。有鉴于此,天皇制新政府发布《废藩

置县》诏书,强令废除全国 216 个藩,解除旧藩主的藩知事之职,并一律从领地集中到东京,坐食国家俸禄。与此同时,打破藩界,全国重新划分行政区,让任免权在中央的府县知事接替旧藩主的后任,一举摧毁了封建割据势力,铲除了阻碍国家统一的经济基础。这样,通过中央官制和地方政权的分途变革,日本开始成为“名实相符,政令归一”的统一国家。

1889 年以天皇“御赐”形式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是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定型化的重要标志。《明治宪法》是一部由天皇亲自决定的钦定宪法,遵循“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旁落”的原则,确立了国家主权在天皇而不在国民的核心理念。第一章关于天皇的 17 条规定是宪法的重中之重,赋予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至高的权限。相关条款如下: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 1 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 3 条);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第 4 条);天皇在帝国议会的协助、赞同下行使立法权(第 5 条);天皇批准法律、命令之公布及执行(第 6 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天皇可命令其开会、闭会、休会及解散众议会(第 7 条);天皇在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敕令代替法律(第 8 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 11 条);天皇有权对外宣战、媾和、缔结条约,有权宣布戒严、大赦、特赦以及授予爵位、勋章和其他荣誉(第 12~17 条)。

根据这些条款,明治天皇拥有了自平安时代(794~1192)以来历代天皇都不曾有过的巨大权力,成为直接统治日本的唯一最高统治者和集行政、立法、司法、外交与军事统帅于一身的国政总揽者。国土和人民都属于天皇,议会形同虚设,内阁只对天皇负责,各个大臣也只是向天皇负责的“天皇个人臣仆”。天皇